

● 王晋卿

孔子的目录学思想

孔子(前 551 ~ 前 479), 名丘, 字仲尼, 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于聚徒讲学和著书立说的需要, 十分重视文献的搜集, 是我国私人藏书事业的开创者。孔子所在的鲁国保存着大量周室的典章制度, 有“周礼尽在鲁”的说法。这给孔子提供了有利条件。孔子一生, 周游天下,

晚年返回鲁国, 不再从政求仕, 将其全部精力集中于著书讲学和文献整理上, 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整理大家。今年是孔子诞辰 2540 周年, 研究他的文献整理工作具有一定意义。他在文献整理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目录学思想, 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孔子整理文献的主要对象是《诗》、《书》、《礼》、《乐》、《易》和《春秋》。春秋以前, “六经”不为儒家专有。“其数散于天下而没于中国者, 百家之学, 时或称而道之”(《庄子·天下篇》)。孔子研讨“六经”为时最早、最久, 他自己坦然表白“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 自以为久矣”(《庄子·天运篇》)。整理的主要方法, 是“述而不作”, 即对散落于世间的文献, 进行搜访、选择、审定、编辑和序录等工作。保持原来的史事和文辞。他

整理的指导思想, 一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怀疑鬼神, 不谈怪异, 不谈暴力, 不谈变乱和鬼神的“不语”思想, 贯通于他整理文献的全过程。以往文献中的有关鬼神、荒诞等内容, 经过精心地审定, 多被孔子删除了。所以, 经过孔子整理而修定的“六经”, 有关迷信的言辞少了。但孔子的“不语”思想并不能说明孔子对“怪、力、乱、神”的反对, 他只是不谈罢了。二是“攻乎异端, 斯害也已”(《论语·为政》)。所谓“异端”, 指与孔子学说不同的“异说”, 也就是不同的学术流派。春秋时百家争鸣, 孔子的“仁道”学说受到非难。孔子在整理文献时, 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言论, 删节与自己学术观点不同的“异说”。

孔子整理文献的“不语”和“攻乎异端”的思想, 也正是孔子的目录学思想。因为孔子的文献工作包含大量的目录工作, 只不过没有系统目录工作的成果罢了。孔子在整理文献时所表现的目录学思想,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全体现出来。

“兼收并蓄”的文献搜集思想

控制文献的目录, 是以文献累积为基础的。目录工作的首要任务, 就是依据所确立的书目主题, 广泛地开展搜集文献的活动。孔子虽无意治目录, 编撰书目, 但是, 出于他传道施教目的所进行的文献整理工作, 却首先需要进行文献的广泛搜集, 包括对当时“贤人”的口耳见闻资料的搜访。春秋以前, 包括春秋时期的文化知识的交流和传播, 主要靠有形

的载体(书籍)和无形的语言(口头)两种形式。鲁国为周王朝的封邑,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到春秋时,不仅保存着大量的有关周代的政典制度等有形文献,而且还有毫豎口耳相传的史事。孔子意识到了后一种史料的可贵与难得,所以,他很重视实地考察,搜访非文字性的第一手资料。《论语·八佾》有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是礼也”的记载。《左传》记有孔子向郑子询问采访到关于少昊氏时代职官制度的珍贵资料。

孔子认为近现代文献比古代容易得到。他说:“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礼记·礼运》),而对古代的却发出“文献不足”的感叹。他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之义”。杞是夏后裔的封地,宋是殷后裔的封地,都是周分封的诸侯国。孔子这种因近及远地搜访文献的思想和方法,为后世目录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如后来的编录“详今略古”思想,宋郑樵的“求书之道”方法,无不受其启迪和影响。

孔子在文献搜集时,特别重视以“礼”为内容的文献。他认为“民之所由生,礼为大”,周代之礼为集千古之大成。孔子对于周礼文献的调查、研究和征求,确实下了一番功夫。鲁昭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19年),孔子34岁时,为了学习周礼,寻求周礼文献,在鲁国君主的支持下,他与南宫敬叔一起从曲阜出发,千里迢迢,到当时周天子的都城雒邑“问礼于老聃”,考察和搜访当地文献。现在洛阳市东关大街北侧的碑楼内丰碑正中还书有后人题写的“孔子入周问礼于此”九个大字。与孔子同时代的老聃,为当时的周之柱下史,职掌国家的文化典籍、帝王档案和章程制度等文献。孔子这次适周考察,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不只搜集到大量珍贵的文化典籍,对周代文献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说:周是在夏、商二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典章制度完善,文化

典籍珍贵丰富,表示坚决拥护周代礼制(“周鉴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我们不难看出,孔子搜集文献的态度是很认真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活动范围是很广泛的,收到的效果也是很大的,既有以文字记载的书籍文献,又有实地调研得到的史事和口耳见闻的记录。这些丰富的原始文献,给孔子提出了如何筛选文献的问题。

“不语鬼神”的文献筛选思想

所谓“筛选”,是指目录工作对于文献的校勘、审鉴、删订和取舍的全过程。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书目质量。筛选文献不光是个方法技术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思想性很强的工作。一个学识渊博的行家,在进行文献筛选时所把握的程度,总是受到世界观的制约和阶级、时代的局限。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孔子筛选文献的目录学思想是很有影响,很有代表性的。

孔子这个大学问家,遵循自己的思想和教育的需要,对其所搜到的众多文献,进行精心的审鉴、删订和取舍。在现存历史文献中有不少记载。如孔子后300多年的司马迁写的《史记》说:“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礼义者三百五篇”。班固《汉书·艺文志》记“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耀南先生考订说,“按《论语》所载,孔子甚喜言诗,诗教之用,尝三致意;而古来诗制,天籁民谣,数千犹不足尽其多,烦滥复重,自在不少,乐师蒙叟更不能编为讽诵”,故有孔子删云者,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删其字。宋代欧阳修说:“‘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尔’,此小雅《棠唐棣》之诗也。夫子谓其以室为远,害于兄弟之义,故篇删其章也。‘衣锦尚絺,文之著也’,此《邶风·君子偕老》之诗也。夫子恶其尽饰之过,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删其句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此

小雅《节南山》之诗也,夫子以‘能’之一字为意之害,故句删其字也”(转引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五)。孔子这样“笔则笔,削则削”的删诗,留下了不少“逸诗”。《国语》和《春秋左传》等有这方面记载。

从古至今,目录工作者对文献的选择,都是在一定思想的支配下进行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在《易》的整理中有明显反映。《易》本来是一部占卜迷信之书,在孔子以前,这类内容的书,有《连山》、《归藏》、《周易》三种,到孔子时流传下来的只有《周易》。孔子晚年,酷爱《周易》,有“韦编三绝”的佳话。他在整理这部书时,尽量摆脱宗教巫术的束缚,使之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哲学名著。《论语》中有“易恒卦”上的“不恒其德,或承其羞”两句话,孔子说:“不占而已矣”,即解释说,“恒卦”上的这两句话,不是占卜之辞,而是鼓励人们做事,应持之以恒。《左传》也有孔子“不语”的记载:鲁哀公六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周太史认为“应在楚昭王身上”,如不祭神,即可转为灾祸。昭王不祭。昭王病,卜人又说河神在作祟,昭王不信,还是不祭。孔子听说,大赞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这就是说,要想治理国家,不能靠天命鬼神,要按仁德、规律办事。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孔子的“不语”思想在文献选择上的体现是很不彻底的。但在《五经》中很少有神怪荒诞之内容,不能不说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筛选文献的结果。在春秋时代,此种思想及其思想指导下的实践,“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

“述而不作”的文献揭示思想

我国目录工作传统的方法和形式,是以著录文献的名称、卷帙、版本等情况,以提要方法简介作者生平、揭示文献旨趣,评述学术得失。这一优良传统,在2000年前就初步形成。孔子整理“六经”所遵循的“述而不作”、

“言作者意”的文献揭示原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汇集篇名,编定目录。古代文献是简牍刻写,篇幅不长,大都以单篇行于世。以篇作为计量单位,相当现在报刊的单篇文章。孔子“睹史籍烦文,惧览之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烦乱,剪裁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孔颖达《尚书》序)。孔子以前,在统治阶层流行的文献《虞书》、《商书》、《周书》、《郑书》、《楚书》中各有单行的篇名。《诗经》有“那”篇。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就以《那》为其首。孔子施教讲学,将选定的有关文献汇编为一书,定其篇目,谓之一书目录。清代学者卢文弨认为,孔子为《易》写的序卦,就是《周易》之目录。“六经”的原始目录,因秦之焚书,无可考详,但亦有踪迹可寻。现以《今文尚书》目录为例:

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

《今文尚书》共28篇。这些篇名的标识有以下几种情况:以篇段首字句名篇的,如有“高宗彤日,越有雉雉”句,故有《高宗彤日》篇,有“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句,故有《西伯戡黎》篇;以君臣名号为篇名的,如《盘庚》、《微子》、《君奭》、《皋陶谟》;取文论为篇名的,如《无逸》中提出为君不应贪图安逸的论点,故有《无逸》篇;又有取文义命篇名的,如言“用臣当共立政”,故有《立政》篇;“所告者即众士”,故名《多士》;“言天地之大法”,故名之《洪范》;以文体名篇的,有誓、训、命,如《汤誓》、《大诰》、《康诰》等。由此观之,《尚书》中篇名的拟定,无规律可寻。“古人著书,

往往不题篇名”，根据章学诚的这一论断，可知古籍中的篇名，多为后人校理时命定。《尚书》各篇名不是一时一人所定（包括孔子拟定的），许多篇在孔子之前就有，孔子进行搜录编次；孔子删定时，很多沿用旧称，谓之“述而不作”，未言新意；《尚书》原是历史文献的汇编，孔子是总编辑者。事实上有些篇目，包括《皋陶谟》是后来儒家加进的。

二是篇章旨意，序录揭示。提要是衡量目录工作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我国古代对于目录提要的撰写极为重视，是我国目录学优良传统之一。提要，古代叫叙录，亦称解题，如陈振孙《直斋书解解题》。然察其流必溯其源，提要之兴，应追溯到孔子写的书序。《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纂《书》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伏羲始作八卦，“孔氏为之象、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隋书·经籍志》讲“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王重民教授在《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说，“六经”中，《易经》的序卦是说明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和内在联系的叙录，《书经》和《诗经》小序是说明各篇“作意”的叙录。他认为提要导源于“六经”中有关篇章的序录。关于诗序的作者，历来为之聚讼，陈跃南《典籍英华》概括出 17 种说法，难以断论；而百篇《书》序却较为明显，被认为是孔子在整理“六经”时所作。现摘录如下：

《尧典》：“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

《大禹谟》：“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益稷》。”

《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贡。”

《甘誓》：“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盘庚》：“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

《大诰》：“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

《君奭》：“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

左右，召公不说，周公作《君奭》。”

《顾命》：“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

《伊训》：“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

此序在《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载有 47 篇，按其性质，有三种类型：一、言谁，而不及作意者，如“周公作《无逸》”，“周公作《立政》”等。此种揭示文献方式，是宋代郑樵所说的“以书类人”，与现在的以作者为标目的方法相类似。二、有篇名无序文而互见者。《尚书》目录在揭示文献上有“互见”之法，如《酒诰》、《梓材》互见《康诰》序文。这和“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则以类举”的方法相似。三、以简明文字，说明历史背景和作意。如《金縢》篇的内容，是说武王病重，周公祈求天神，请代武王死，并将祝辞书于金縢纳入匣子中的史事。其序高度概括为“武王有病，周公作《金縢》”。这在揭示文献内容上有一定的深度，益于读者选读。这些言其要旨的书序，若别集为一篇行世，可谓之举要目录，与现在的导读书目类似，它开了儒家“讲经”“开题”的先声；倘附见《尚书》，分冠于篇首，那么它又与后世释家“讲经”“发题”类似。

“分门别类”的文献编次思想

所谓“编次”，是指目录中组织与编排文献的方法，它使文献系统化、有序化。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说：“一书之中，简篇既宜有先后，则其次序自当有义，不可随意信手，如积薪然也，故必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分别部居”是目录之要素，在古代目录学上称为“类例”，又有“种别”、“部次”、“编排”、“序次”、“编次”等称谓。文献编次是孔子整理文献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知道，孔子删订“六经”，将选定的文献，绝非随意信手，相杂堆砌，而是用了一番心思，作了精心编次。《论语》中孔子自白：“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

各得其所。”“各得其所”是孔子编次文献的结果。孔子学专家匡亚明在《孔子评传》中说：“孔子以前，《诗》的体制和今天《诗经》大体一致，只是国风的编排次序有所不同，足以说明孔子即或删诗重点在编排次序上。”现在的《诗经》目录编次，确实详尽而科学，条理有术，列表如下：

国风	周南：	《关雎》、《葛覃》、《卷耳》…
	召南：	《鵲巢》、《采芣》、《草虫》…
	邶风：	《柏舟》、《绿衣》、《燕燕》…
	鄘风：	《桑中》、《君子偕老》…
	卫风：	《淇奥》、《考槃》、《硕人》…
	王风：	《黍离》、《君子》、《于役》…
	郑风：	《缁衣》、《将仲子》、《叔子田》…
	齐风：	《鸡鸣》、《还》、《著》…
	魏风：	《葛屨》、《伐檀》、《硕鼠》…
	唐风：	《蟋蟀》、《采芣》、《葛生》…
	秦风：	《车邻》、《驺虞》、《小戎》…
	陈风：	《宛丘》、《衡门》、《月出》…
	桧风：	《羔裘》、《素冠》、《匪风》…
	曹风：	《蜉蝣》、《侯人》…
	豳风：	《七月》、《东山》、《伐柯》…
雅	小雅	鹿鸣之什：《鹿鸣》、《四牡》…
		南有嘉鱼之什：《六月》、《吉日》…
		鸿雁之什：《鸿雁》、《沔水》…
		节南山之什：《节南山》、《正月》…
		谷风之什：《谷风》、《四月》…
		甫田之什：《甫田》、《大田》…
	大雅	鱼藻之什：《鱼藻》、《采芣》…
		文王之什：《文王》、《大明》…
		生民之什：《生民》、《既醉》…
		荡之什：《荡》、《抑》、《桑柔》…
颂	周颂	清庙之什：《清庙》、《维清》…
		臣工之什：《臣工》、《丰年》…
		閟宫小子之什：《访落》、《菽之》…
	鲁颂	—— 駉之什：《駉》、《有駉》…
	商颂	—— 《那》、《烈祖》、《玄鸟》…

这个类目表，也就是《诗经》的篇名目录。

它是3大类，20个小类，14之什来统驭305篇文献。在某种意义上，孔子是我国三级分类目录的创始者。当然，这个类例体系的完善，决非出自一时一人，但孔子所起的作用，却不可忽视。孔子对我国分类目录，特别专科分类目录的编次，是有很大贡献的。孔子在删订“六经”时所使用的文献编次法主要有四种：

一、逻辑编次法。孔子编订“六经”作为教本，除贯穿着他的政治意图外，还要照顾到学生的接受能力。所以，在文献的编排上，他采用了由浅入深的逻辑法，如《诗经》的风、雅、颂之次序：风——地方性之民间歌谣，通俗易懂，故位于首；雅——贵族的高雅乐歌，较为难懂，故次之；颂——宗庙祭祀和重大典礼的颂歌，宗教色彩浓，深奥难解，故排在最后。这种编次法，有较强的逻辑性，对于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地阅读，有很大帮助。今天的推荐书目或导读书目，在文献编排上，仍沿用这种方法。

二、地域编次法。古代重视诗歌礼乐，设置专门官员采集乡、邑、国流行的歌谣，陈于天子，以观民风。从民间搜集来的歌谣，具有鲜明的地方性。为方便了解各地域的歌曲所反映的风俗民情，《诗经》中的“国风”又按地域编次分为：周南——古地域（今陕西和河南之间）；召南——古地域（今河南和湖北之间）；邶——古商邑（今河南汤阴）；鄘——周武王封三监，使蔡叔居鄘（今河南新乡）；卫——周初之国（今河南淇县）；王——西周之东都——（今洛阳市）；郑——周之郑国（今河南新郑）；齐——周初诸侯国（今山东北部）；魏——西周诸侯国（今山西芮城县）；唐——周成王封其弟虞于唐（今山西翼城）；秦——周孝王分封的诸侯国（今甘肃天水）；陈——周武王封地（今河南淮阳）；桧——西周诸侯国（今河南密县）；曹——周武王封其弟于陶丘（今山东定陶）；豳——古都邑名（今陕西旬邑县）。这种按地域编次文献法，在今地方文献目录中仍在使用的。

三、时序编次法。按事物发展的时间编次文献，便于了解事物发展的过程。孔子修订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其论事方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晋杜预《左传》序）。具体说，《春秋》记事法有二：一是按年、时、月、日为顺序编次，如“隐公元年夏五日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日不明的则有年、时、月，如“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月不明的，以年、时为序，如“庄公十有六年夏，宋人、齐人、卫人伐邾”。二是排比史事，即“比事”。《礼记·经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比事”是孔子用以表达《春秋》之义的一种编次史料的方法，它通过排比事体，以达到“修王道，正名分”的修史最高宗旨。中华书局出版的《目录学概论》中提到的“编年编排文献法”，最早始于孔子的《春秋》。

四、先祖后宗编次法。孔子崇周制、重礼教，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孔子将这一“礼治”思想，寓于文献编次之中，如《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列文王之大雅《文王》、《大明》等诗

篇为首，而武王之大雅《下武》、《文王有声》等篇次之，周公之正大雅《生民》、《既醉》等又次之。这是“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按名位次序的文献编次法。清代章学诚“制书为尊”的思想，可能是受其影响而形成的。

孔子认为“礼”是有继承性和连续性的。自夏产生“礼”后，继夏的殷对夏礼进行损益形成了殷礼；继殷的周对殷礼进行损益又形成了周礼。故《尚书》目录是以虞、夏、商、周之次序编次的。

周室衰微，礼坏乐崩；社会大变，学术昌盛；诸子蜂起，百家齐鸣；大圣孔丘，奇立群英；始创儒学，致力仁义；私兴教育，聚徒讲学；继承遗产，整理“六经”；博集广采，择善从优；撮其旨意，方成序录；分门别类，条明科部；精心编次，为了致用。于是，中国目录学就在这块肥沃土壤上诞生了。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图书情报学系。

来稿时间：1989.7）

蒙古图书馆代表团访华

根据中蒙两国1989~1990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应文化部图书馆司的邀请，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央图书馆馆长查嘎其为团长的蒙古图书馆代表团一行5人于1989年9月11日~23日对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代表团在华期间，先后参观考察了北京、上海、内蒙古自治区的图书馆事业，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市崇文区图书馆、北京市昌平区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伊克昭盟图书馆的同行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业务交流。查嘎其团长还应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学会之邀，为呼和浩特图书馆界作了题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图书馆事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讲演。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文化部图书馆司司长、北京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杜克，文化部图书馆司副司长鲍振西还先后会见了代表团成员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双方就今后进一步扩大图书交换、互派馆员、加强两国图书馆界的交流与合作达成了一致意见。杜克同志还以第四届亚大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东道主的身份向查嘎其馆长发出邀请，热忱希望她今年12月届时参加此次会议。据悉，蒙古图书馆代表团的这次来访是中蒙两国建交以来蒙古图书馆界第一次访问我国。（白国庆）

Confucian idea on bibliography/Wang Jinqing//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9,15(4). -42~47

Confucius was a great Chinese ancient ideologist and educationist. He was also the first expert of sorting out documents in Chinese history. Confucian idea on bibliography produced in sorting out documents, which involved much bibliographical work. It includes the document collection idea of "incorporating things of diverse nature", the document screening idea of "no taking of ghosts and Gods", the document revealing idea of "no blurred" and "speaking authors' meaning", and the order of arrangement idea of "putting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When Confucius revised "Six Classics", he used 4 orders of arrangement, by logics by regions, by time sequences, and by ancestors first and clans afterwards. In a sense, Confucius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ree-level classified catalogue.

Confucius — — — Research

History of bibliography — — — China

G257.09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ibliography/Shen Chang//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9,15(4). -48~51

The word of bibliography is of long-standing. The first special bibliography "Bing Lu", the first summary bibliography "Bie Lu", & the first national bibliography "Qi Lu" appeared in the Han Dynasty. On this basis, three systems of Official Bibliography, History bibliography and private bibliography formed; the narrative, biographical and compiling systems for cataloguing produced and over 2000 bibliographers and 4000 works emerged. In order to develop document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 information service, we should impel our bibliography work to develop continuously.

History of Bibliography — — — China

Bibliography — — — Review

G257.09

Chinese Libraries in the 1930's — as viewed from early IFLA records/A. J. Evans, A Translated by Li Bing//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9,15(4). -52~54

China was in effect one of the 15 founding members of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before 50 years. In January of 1928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informed that Dr. T. C. Tai, librarian Tsing Hua College, as chief delegate (and Mr. T. L. Yuan, associated director, Metropolitan Library, Peking, and so on) have been appointed to attend the Fir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Library and Bibliographical Committee held in Rome. In 1932 Mr. T. L. Yuan by then the libraria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in Peking, representing the Chinese Library Association, attended the 5th Session. In 1935 meeting Mr. C. P. Wong gave a summary of the work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Mr. Yu, Houo-Joei was the representative at the 1936 meeting. After this there was no Chinese delegates attending the meeting for a few years. In 198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returned to membership of IFLA. China sent Ding. Zhigang, deputy director of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nd vice-president of a council of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as representative to the meeting. It was indeed very inspiring. The membership of China is a very active one. There is